

# 中國佛教之興衰及今後的展望

文 珠

## 一、緒 言

佛教傳入中國，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歷史，其承受之深博和發展的宏遠，誠不愧為佛學之第二祖國，如日本朝鮮安南等地之佛教，固屬分承中國佛學的交流，而西藏佛學，又何曾不受中國佛學之影響？的確，中國佛教除全盤承受印度所傳來的大小乘佛學外，且於中國民族文壇的偉大悠遠之基石上，更開展了中國佛教之特色，因是不特成為高麗日本等地佛教之祖國，更在我國文壇界放出永垂不朽之光芒，和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特別是隋唐之際，這德智巍巍的中國佛教，竟然躍為我民族思想界之權威者，當時中國第一流的思想家，無一不是出自佛學者，唯惜唐宋以還，由於三武教難的摧殘，後因異教來華之影響，致使彪炳一時之佛教，由全盛而保守，由保守而陷於衰頹，迨及今時，三武教難之慘劇復見之大陸，而佛教命運，亦因而氣息奄奄，危在旦夕，有心者能不痛心疾首，感慨奚之？雖然，但根據目前世界人心之要求與傾向而言，當此黑暗與光明交替之際，未嘗不是振興佛教的千載良機，是以今日佛教雖面臨死亡之威脅，然另一方面却是更生的機會，其命運正處於滅亡及復興之夾縫間，亡耶？興耶？則要看乎今日佛教徒對於自己的責任與使命所採取之態度和行動而定，吾輩佛子果能適應現代人心之要求，把握千載一現之良機，起而團結一致，努力於復興佛教工作，則佛日重輝，自可指日以待，否則，滅亡之神勢將逼近，筆者雖愚，然有鑒於斯，因而追言我國佛教往昔之隆替，分輸入、進展、全盛、衰頹、革新等時期敘述，然後以客觀的批評態度，究其興衰之結癥所在，作為今後佛教前途之龜鑑和復興之要道，是為寫本文的意旨，其餘有關佛教教理的發展，及其思想的演變，則非本文所論，至於本文之取材，是以蔣維喬所著，及黃懺華所著之「中國佛教史」為原始材料，此外，復以其他有關的書籍作為參考。

## 一、中國佛教輸入時期

關於佛教輸入中國之始，有種種異說，據一般相傳而為佛學者所公認的，是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元六十七年）遣使西域訪求佛道之說。據史稱：永明七年，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且以問於群臣，大史傳毅對以「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帝乃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博

士王遵等十八人使西域，求之。十年。愔等於大月氏國，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得佛像經卷載以白馬，共還洛陽，帝為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馬寺，是為此土有沙門之始，亦為此土有寺院之始（見黃懺華著中國佛教史第一章），但反是說者則謂永平以前，我國人已知有佛教，如唐道宣於所撰廣弘明集歸正篇第一之一，引用列子（仲尼第四）之西方聖者說：「孔子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此似乎孔子已知有佛並知佛之教化，不過列子一書，歷經學者研究，斷為魏晉間偽作，未足據為信史，或謂孔子所言聖人，未必乃指佛說，但朱士行經錄：「秦皇政四年，西域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始齋佛經來華；王怪其狀，捕之繫獄旋放逐國外。」又魏書釋老志：「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邪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國有浮圖之教。」又梁阮孝緒七錄序：成帝時；劉向檢校秘書，編定目錄，其中已有佛經，蓋秦政既設挾書之禁，令民間不得藏書，惠帝始除此律，稍稍搜集天下書籍。成帝之世，命陳農廣求遺書，使列向父子讎校。向亡，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從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群篇，奏其七略。「佛祖統記引劉向列仙傳曰：「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撰列仙圖，自黃帝以下，迄至於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檢定虛實，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餘人，已見佛經矣。」又釋老志：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以上諸書所載，俱謂我國人知有佛教，為時更古，不始於漢，乃遠在周末，但此俱為斷片之史料，除其本身孤證外，無他可徵文獻足助證明，或容有之，仍不足憑。歷史上最有根據者，則為後漢書楚王英傳。如後漢書云：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喜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永平）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繯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練白紵三十四，詣相國曰：記在著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練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一伊蒲塞（即優婆塞）一桑門（即沙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梁啟超亦以此說較為可靠：「此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國人信仰佛教見於載籍者，自當以英為首，然以帝子之尊，而服其教，則在社會中先已

植有相當之根柢可知，故教義之輸入，不得不溯源於西漢之季也。一見飲冰室專集「佛教之初輸入」。同時梁任公並力斥漢明帝求法之說，全屬敵視佛教之道士王浮，欲證明佛教晚出，自圓其謂佛為老子弟子之說而虛構的，據筆者愚見揣測，秦始皇與阿育王同時，（始皇西紀前二四三——二一七。阿育王西紀前二六六——二三〇。）阿育王為一虔誠的佛教徒，會派遣宣教師二百五十六人於各地，其派在亞洲者，北至俄屬土耳其斯坦，南至緬甸，且當時中印海路交通似已開通（法人拉克伯里考據此事頗詳）然則阿育王在位時曾派遣高僧來華傳教，固屬意中事而非不可能者。唯當時既值坑儒焚書之際，則來華之僧人自與當時被坑之儒同一命運。所以佛教最初輸入我國民間應始自武帝通西域後。至漢明帝時，天竺迦葉摩騰，竺法蘭來華，朝廷尊之寵之，且於白馬寺開始譯經，世人遂視為異聞而傳播於後世，佛家亦據此而公認漢明帝永平十年，為佛教輸入中國之始。實則，中國佛教史，至少亦中國佛教經典翻譯史，始於後漢末年桓靈二帝時代，因為自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來華後，訖桓帝時安世高，支婁迦讖來華之前，八十年間，中國史乘，無一言涉及佛教者，然繼安世高來華後，則西域之譯經師，相繼東來中國，廣事翻譯。如公元二世紀之中葉，桓帝建和初年，月支國支讖來華，譯般若三昧經等二十餘部，翌年安息國王子安世高來，譯經九十餘部，又熹平元年年有天竺僧佛朔譯道引般若經。公元二世紀之末葉，獻帝興平二年，牟子由儒入佛，因譏之者多而作理惑論辯明釋迦之至尊。此外靈獻二帝間，有安息優婆塞安玄、沙門支曜、康巨、康孟詳等東來致力譯經工作，至是時佛教不獨為帝王所好，而亦漸流布於民間。

三世紀之中葉，為我國三國時代，佛教雖曾流布北地之魏，然僧眾又未稟師戒，及嘉平中，中天竺曇摩迦羅來洛陽，譯出僧祇戒本，又請梵僧立羯磨法授戒，大行佛法，是為此土有戒律受戒之始。至於吳地佛教之興，則有賴支謙、康僧會等譯師之功。支謙，為安世高與支讖以後之譯經大師。識有弟子支亮，亮有弟子支謙，是為三支，當時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支謙字恭明，本月支國人，祖父法度，於漢靈帝時，率國人數百歸化中國，因此譯生於中國，及長，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藝術亦多善巧，遍學異書，備通六國言語。獻帝末年避亂於吳，吳主孫權，因聞其博學有才而召見之，拜為博士，於是謙不獨大弘佛教，且自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凡三十餘年間，譯出大度度經、維摩經、首楞嚴經……等大小乘教典約三十餘部，後赤烏十年，沙門康僧會至江南，游說吳主孫權，建造塔寺，是為江南佛教興起之始。

三世紀之末葉，為我國西晉時代，此時佛教在中國唯盛譯經典，而其重要譯師，則為竺法護。竺法護原為月氏國人，本姓支，世居燉煌，八歲從外國沙門竺高座出家，隨其師遍遊西域諸國，通曉三十六國言語文字，

西晉泰始二年，至永嘉二年，譯出大小乘經論凡數百部，終身譯寫，勞不告倦，且於譯寫之餘，積極從事宣講佛法，是以民間信佛者漸多。至公元四世紀之初，晉懷帝永嘉四年，西域之佛圖澄來洛陽，宣弘佛法，澄戒節嚴明，妙解深經，並通世論，其演說口才，又為動聽，慕其德望而追隨受業者，常數百人，而前後門徒，不下一萬。其中竺法汰等數十人俱為其門下知名者，然其間尤以道安最著。道安童年出家，天質聰敏，有大志，師事佛圖澄時，已驚四隣，及壯年遊學諸方，備求經律，力建塔寺，恒開講筵，時有襄陽高士習鑿齒，聞安至即往禮見，自稱「四海習鑿齒」安答以「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對。安在襄陽十五年，每歲必講放光般若未曾廢闕，孝武帝欽其德風，遣使通問。及前秦苻堅鑿健子生位而自立，遣苻丕攻陷襄陽，得安及習鑿齒送往長安，苻堅喜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可見當時道安負譽之盛而德學之高了。道安不獨卒生致力於譯寫及講經工作，且從事著述。其所著之淨土論六卷，為其弟子慧遠盛弘淨土法門的至寶。慧遠為道安門下知名之士，孝武帝大元十五年，卜居廬山，從事淨土念佛，因其內通佛理，外善群書，為當代物望所宗，聞風來歸者甚眾，遠公與彼等結白蓮社於廬山東林寺，時白蓮社有綱素大德十八人，如譯華嚴之佛陀跋陀羅，及佛陀耶舍、道生、僧叡、慧持、慧永、曇順、曇恒、道昇、曇說、道教、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全、宗炳、雷次宗，並遠公世稱廬山十八高賢，幾成為當時佛教之中心，而中國佛教弘傳至此，亦由輸入時期臻於進展時期。

### 二、中國佛教發展時期

綜上觀之，則佛教輸入我國，當於公元五世紀以前，自我國漢初迄晉末之間，至其進展時期則為五世紀以後，在我國南北朝之際。實則在輸入時期，早已漸有進展，然進展期間，亦仍不忘輸入，此不過舉其顯著者言而已。在輸入時期，外國譯師，雖接踵而來，且譯出經典不鮮，唯當時翻譯之處，非由朝廷指定，朝廷亦不加以保護，不過於布教修道之暇，從事譯寫而已，或成書於行旅之際，或就大部中抽譯一二，沉所譯經典，尤以小乘居多。及五世紀初年，羅什東來，中國佛教之輸入，不獨由全盛而日趨進展，且大乘佛教亦漸見盛行於中國。

鳩摩羅什，略云羅什，原為西域龜茲國人，幼年出家，遍遊西域各地，初專小乘，後轉學大乘經論，每洞其秘奧。時為五胡亂華，十六國競起，前秦苻堅建國長安，統一北方諸國，因聞羅什名聲，遂於建元十八年九月，遣臣呂光征西域，殺龜茲王白紀，立其弟震，携王女及羅什返，呂光回軍至涼州，驚悉苻堅戰敗身亡，遂自立於涼州，稱涼王。及後秦姚萇死，其子姚興即位，遣將討呂光之子呂隆，因迎羅什入關，禮為國師，甚加優遇，以西明閣及逍遙園為譯場，廣譯經典，使沙門僧肇等八百餘人，詔受襄譯，為我國佛教翻譯大革新時期，尤以羅什所譯經典範圍廣博，部帙

浩繁，多以發揮印度龍樹提婆之思想為教宗。其譯出大品般若經，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及龍樹、提婆二菩薩傳，不獨為我國三論宗之始祖，且在我國佛教教理之革新方面，亦為大發展時期。

當時的羅什，備受朝廷之尊崇愛戴，優厚衛護，加之羅什學識高，冠絕當代，門徒數千，英才林立，故其聲勢顯赫，如旭日方升，威震遐邇，餘諸譯師，無不瞠乎其後，惟新來之佛跋陀羅（譯云覺賢）可與之比肩。覺賢原藉北天竺，於義熙二年來華，時羅什喜而迎之，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又有疑義，必共諮詢，唯是時羅什門下諸僧，往來宮闕，盛修人事，而覺賢靜守自守，不與眾同，且於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靜者聞風而至，因而羅什覺賢二派，漸形對立，後因偶告弟子，昨見天竺五舶俱發，又其徒自言得阿那含果，羅什門下僧侶，以為顯異惑眾，共攬之，因而去長安，南下廬山，依慧遠。後與法顯共譯大方等如來藏經，大方廣佛華嚴經等數十部，華嚴經之譯出，不獨為中國佛教史之一大事，亦為肇後華嚴宗之端緒。

慧遠為道安門下傑出者，擅青出於藍之譽，本其師志，以超俗脫塵恬淡無欲為旨，當羅什大興北地佛教時，隱居廬山，力避權勢，嚴持戒律，其生活又如深秋枯木，旨趣閑寂，成為南地佛教之特色。遠近聞風慕學而來者絡繹不絕，於是廬山成為南地佛教之中心，與羅什所領導之北地佛教遙遙對立，是為我國佛教南北二派並立之始。然衡其大勢以相比較，則北方佛教，多帶宗教色彩，南方佛教，多帶哲學氣味，北人質直，信仰力堅，南人灑脫，理解力強，北學尚專篤，南學尚調融，在在皆足以表南北風氣之殊異。

總之，佛教自秦末漢初輸入中國後，唯傳譯之業為盛，尚未弘通，及東晉時，先有道安慧遠，發弘教之端緒，後有羅什力弘聖教於長安，至時中國佛教不獨具有良好之譯本，系統之教義，且在朝在野，崇佛者與日俱增，再加以南北朝歷代帝王之極力興隆佛教，建寺供僧，一方面鼓勵國內人士出家為僧，另一方面邀請外國名僧來華，如東晉時代的道安、慧遠、法顯、智嚴、寶雲、法勇、羅什門下之僧肇、道生、道融、慧觀、梁之法雲、智藏、僧晏等三大法師，陳之慧思、智顛，魏之僧朗、法果、慧覺、道辯，東魏之曇鸞等，俱為我國魏晉南北朝時知名高僧，而宋文帝時來華之求那跋摩、僧伽跋摩、曇摩密多，求那跋陀羅；梁武帝時東來之真諦三藏，魏宣武帝時來華之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外國學者，亦為應請而來的佛教耆德，於是當時佛教在中外學者，協力傳譯闡揚之下，不獨思想漸趨成熟，開隋唐各宗派之端緒，而其教義及系統之組織，亦日益進步，為我國佛教全盛時代的先兆，故一般史家稱此時為中國佛教之進展時期。

#### 四、中國佛教全盛時期

佛教自入華後，經兩晉及南北朝的傳授演繹，至隋唐之際，不特思想成熟，教義精密，且派別競起，宗門林立，而其宗派及教義，又為我國佛教之精華，是以隋唐兩朝，實為中國佛教之全盛時期，無論新宗派之成立或新教義之組織，俱誕生於此時，如隋朝之吉藏開創三論宗，智顛開創天台宗，賢首開創華嚴宗，玄奘又傳來法相宗，善無畏傳來密宗，此外善導之念佛宗，慧能之禪宗，道宣之律宗，皆為綜合前人之研究而新成立之宗派。雖在隋唐以前，已有俱舍、成實、涅槃、地論、攝論等宗派出現於世，但其出世後，或融合於他宗，或因勢力未盛而衰，迨及隋唐，緣於名德輩出，或對前人思想益發揚光大，或獨自闡發而另豎一宗，或新取自印度而組成系統之學，因而隋唐佛學蔚然建立以上八大宗，且極其盛行於世。

天臺宗以其始祖智顛，住浙江天臺山而得名；以妙法蓮華經為一宗正所依之經典，以大智度論為其指南，以般若涅槃經為其解釋上之扶疏，以大品般若經為其觀心之本，並引諸經論以增信及助成；原始於北齊慧文，慧文傳慧思，思傳隋之智顛，遂集前人之大成而立此宗。其學統為龍樹、慧文、慧思、智顛、灌頂、智威、慧威、玄奘、湛然九祖相承，其教義則以諸法實相論為中心，以一心三觀法為經，十界三千諸法為緯，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一代聖教。此宗之成立，實為隋代佛教之重要事業。

三論宗始自羅什，後百創年間傳習極盛，至隋吉藏大成之，因以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立宗，故名三論宗。其學統為羅什、僧肇、僧朗、僧詮、法朗、吉藏等六代相傳。至其教義則以破邪顯正為一宗之軌要，以真俗二諦，八不中道，三科等為義。唐初猶高德輩出，中唐轉衰，一部分入「天臺宗」，一部分入禪宗。

華嚴宗，專依大方廣佛華嚴經，談法界緣起事事無得之妙旨，故名華嚴宗。華嚴經乃東晉時自印度至後秦之佛陀跋多羅所譯，隋時杜順發揮其學，傳於唐之智嚴，嚴傳之法藏，法藏學賢首，作華嚴疏大弘其旨，故其宗派之相承為杜順、智嚴、法藏，而其學統之相承，則為慧光、道憑、靈祐、靜淵、智正、智儼、法藏。至其教義與天臺宗之教理，共稱為中國佛教之精華。蓋天臺教義為諸法實相之法門，而華嚴教理，則為法界緣起之法門，天臺宗談性具，華嚴宗則論性起，故以法界緣起，四法界、十玄門、六相圓融等組織教義。並以五教十宗，判釋一代佛教，故與天臺宗遙遙對立，為隋唐最精密而又最盛行的宗派，惟至唐末，衰微。

法相宗以明諸法之體性相狀為宗，故名法相宗，又依唯識論明萬法唯識之妙理，亦名唯識宗，唐貞觀年間，玄奘赴印度求學，受法於尸羅跋陀

羅、洽唯識論，及歸國，大事翻譯，盛弘法相唯識之玄旨。玄奘為中印文化交流之第一功臣，亦為我國佛教新譯時代之泰斗，與弟子窺基等，共譯經七十六部，一千三百四十餘卷。然玄奘所譯之卷帙，雖富於羅什，而羅什所譯之範圍，則廣於玄奘。故言舊譯者，必稱羅什，言新譯者，必推玄奘。印度大乘，無過二宗，一曰中觀，一曰瑜伽，羅什所譯傳者為中觀法門，而玄奘所弘，則為瑜伽法相，後人於羅什系統，創立三論天臺等宗。而玄奘之法相唯識學，其弟子窺基最能傳之，因而開創法相宗，故其學統之相承，為彌勒、無著、世親、護法、戒賢、玄奘、窺基、慧沼、智周。此宗之教義，則依據萬法唯識的原理，建立五位百法，三性四分，以及阿賴耶緣起之說。其組織之嚴密，分析之精微，及其方法之富於演繹與歸納精神，尤為前此所未有。故當時之天臺華嚴兩宗，雖被稱為中國佛教之精華，然其所說，亦僅當於今世西歐哲學所謂「形而上學」之一部份，而法相宗所說則當其所謂「認識論」之一部份，故法相宗亦為唐代教下三大家之一，與天臺華嚴，鼎立盛行。

律宗，為依戒律立宗之一派，與其他依定慧立宗之諸派異，此宗以五部律中四分律為主，始於姚秦慧光——道覆律師，而大成於唐朝道宣。當道宣之南山律宗盛於唐時，與之並弘者，尚有相州日光寺法礪所開的相部律宗，及西太原寺東塔懷素所開之東塔律宗，與道宣之南山律宗，並稱律宗三家，在唐代各立異議，論評不絕。

淨土宗自東魏曇鸞大師弘通他力念佛法門始，曇鸞圓寂後，弘通淨土法門者，有慧遠、智顛、吉藏等，然能繼曇鸞之淨土系統者，當推唐道綽，善導繼道綽後，致力淨業，規模漸備，遂立淨土宗。善導之意見，與慧遠、智顛、吉藏等頗多相違，慧遠等在教則謂以自定散修力往生，在機則九品通凡聖，而善導則以佛願力往生，九品皆凡夫。故主張教屬他力，機是凡夫。更有與善導同時盛弘淨土法門而異系統者為慈愍三藏，其主張事理雙修，教禪合一，與善導不同，故世稱此二者為善導流、慈愍流二派，而善導派尤為盛行，慈愍派於後世之影響，似不甚大。

禪宗淵源始自姚秦時代，自羅什譯出坐禪三昧經後，即有道生，慧觀等傳於南方，一主頓悟，一主漸證。同時又有罽賓國之禪匠佛陀跋陀羅來華弘禪業，是為我國佛教禪法之始，然禪宗之成立，則創自慧能而以達摩為初祖，故其學統：為達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神秀，其要旨則主張不立文字，唯以二入四法為修行要道，以傳受心印，直指心源見性成佛為鵠的。從達摩至弘忍五代，俱是衣鉢單傳，五祖以下，則有南禪北禪之別，南禪為傳受衣鉢之六祖慧能，北禪則五祖大弟子神秀大師；神秀重教授，主漸悟，慧能重性靈，主頓悟。神秀一宗中唐漸衰，後傳入日本，為日本禪宗之始，而慧能一派則盛行於南方，及唐末南宗分青原

南嶽二派，而南嶽又分臨濟、滂仰二派，青原則分曹洞、雲門、法眼三派，於是禪宗掩襲天下而諸宗俱廢，公案如麻，語錄充棟。唐佛教之盛極於此，然唐後佛教之衰亦導源於此。

密宗：密教聖典之傳來，始自晉懷帝永嘉年來華之帛尸梨密多羅所譯之大孔雀王神咒經，孔雀王雜神咒經。嗣後各時代皆不斷發現有關密教之譯本，具各時代東來之翻譯沙門中，亦多善持真言密咒，及唐玄宗時東來之所謂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及不空等，又譯出大日經、蘇悉地經、金剛頂經。不空之弟子惠果傳持師承，宣揚厥旨，密教遂大行於華，其教理之組織，本乎毘盧遮那佛直接所說之秘奧大法，不易說明，故以其談理，毋寧崇實。其宗旨則以儀式祈禱為主。

唐代佛教，在歷代帝王之庇護崇奉下，不獨名德輩出，且宗派林立，由於宗派林立，且其教義之精傳，系統的嚴密，及相承之弘達，誠為隋唐以前所無者，故史家稱唐為我國佛教新教義之組織時代，由於翻譯名德之輩出，某所譯經典，思想之豐及數量之巨，恐唐以前翻譯者罕與比倫，故史家稱此為我國佛教之新譯時代。且因當時翻譯名家大都不曾受到我國中古文學體裁之影響與限制，而翻譯出來的經典，內容之豐富，詞藻之純潔，體裁之自然，文學色彩的濃厚，文字組織的精密，以及偶頌歌讚的謹嚴格調，文法字句的精警老鍊，不但給予我國文學極大影響和對唐代文藝復興和學術思想有莫大貢獻，且成為當時思潮的主流，當時之第一流思想家，皆為佛學家，由是可知唐代之佛學誠為我國歷史上佛教隆盛達於極點的時期，而佛教至精之教義，至深之哲理，至美之文章無不出於此時。

恭賀

新禧

蓮華寺住持釋慈空

竹北鄉犁頭山